

問題人物陳獨秀

謝康

大錯鑄成悔之晚矣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由陳獨秀、李大劍等依莫斯科意旨發起組織的「第三國際中國支部」，如今將近六十年了，而「中國共產黨」（這個「支部」對中國人自稱的名字）特有蘇聯的援助，竟然以武力竊據中國大陸到現在也快三十年了。歲月如流，世事滄桑，這些最初參加中共組織的傢伙，包含李大劍、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內，都已經成爲塚中枯骨了。俗語說：「鬼怕惡人。」但無論怎樣窮兇極惡的人，到頭來總抵抗不過死神的威力。所以諺語又說：「閻王要你三更死



問題人物陳獨秀嘴臉。

，不能留人到五更！」既然上帝給予人們「本日期，讓他每天撕掉一張，百年三萬六千日，算是最長壽的？但畢竟有撕完那本日曆的時候。早晚總要「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的！我現在提筆寫問題人物陳獨秀，也好像寫「瞿秋白的悲劇」一般，不勝感慨繫之了！

馬克思共產主義運動，是全人類文明進化史上的逆流；列寧所建立的赤色政權蘇維埃聯邦和第三國際，以及史達林所一手培植羽翼的中共匪幫，則爲人類的惡性毒瘤，也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變局。陳獨秀、李大劍雖說都是知識分子，但他們的學問知識見解不够深遠，因此還十分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真相。至於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些人，更是等而下之，對「資本論」最多祇是一知半解而已。然而他們都藉着馬恩列史的招牌和後台老板蘇聯的輿援，以發展其奪權的慾望和個人的野心；願爲蘇聯或共產國際的貓腳爪和鷹犬。而且甘心出賣自己國家民族的利益，背叛他們曾經一度宣誓仰服從的國民黨總理及其主義。說到人格和品德問題，他們都是早已完全破產的了！陳獨秀到了晚年，雖能覺悟前非，但大錯既成，真是悔之晚矣！於此，我們不得不相信索忍尼辛所說：了解共產主義十分不容易，因爲他們的唯物辯證法，善於偽裝

。索忍尼辛一九七五年六月在華盛頓對美國人演講會說：

「……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訂的事項，比實際所做的更爲可怕。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讀到這份文件，但是，不知何故竟沒有人想要瞭解或能够瞭解共產主義的眞象。」

我想：索忍尼辛這番話，對於那些正在玩弄「中共牌」的美國人用得着，對於民國九、十年至十六、七年會經想玩弄「第三國際牌」的陳獨秀等人，也用得着。因爲他們並未能瞭解清楚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俄國施行共產主義的眞象。他們一心想玩國際牌，反爲第三國際所驅使和利用。俄國有一句諺語說：「當你滾下山時，就會明瞭。」陳獨秀晚年覺悟，正是當他被滾下山以後的事！

壞鬼書生別號甚多

陳獨秀，原名乾生，字仲甫，別號實庵，民國前三十三年即清光緒五年己卯（西元一八七九）十月八日，生於安徽懷寧縣（即安徽省城）大南門內南水關。說也湊巧，轟動全國的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或者說全盤西化運動）的兩位領導人物，都是安徽省人，一個是安慶府的陳獨秀，另一個是徽州府的胡適之。而安慶和徽州二府的头一個字，正是這個安徽省得名的由來。據霍山

孫雨航前輩的「近四百年來安徽學人錄」所收錄的學人，以縣為單位，則桐城、歙縣最多，休寧、婺源、合肥、績溪等縣居其次。若以府而論，則徽州府的人文鼎盛，超出於安慶府甚多。我們若從胡適、陳獨秀二人的學問人格來作比較，也可以得到證明。

陳獨秀和胡漢民（字展堂）同年生，但比胡的月份大些。他一共只活了六十四歲，（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在江津去世，六十三歲未滿）在這六十四個年頭中，一半在滿清時代，一半是在民國，可說是一半是滿清人，一半是民國人。在滿清末，他想推翻滿清政府，建立共和；在民國十六年前後，他搞共產黨，要建立蘇維埃政權。

由清末至民初這個過渡時代的知名人物，年紀比他稍長的有好幾位：如康有為比他大二十一歲，梁啟超比他大六歲，國父孫先生比他大三歲，吳稚暉比他大十四歲，蔡元培比他大十二歲，章太炎比他大十一歲，居正比他大三歲，張靜江比他大兩歲。胡漢民和他同年生。年紀小於他的名人，如張君勱則小他八歲，熊十力和太虛法師各小他十歲，曾琦和陳果夫各小他十三歲，李石曾、馬君武各小他兩歲。至於張繼則小他三歲，李大釗小九歲，蘇曼殊小五歲，胡適小十二歲，戴季陶小十一歲，瞿秋白小二十歲。又從筆者父親的年齡看來，陳獨秀比我父親小了兩歲。所以對我來說，他可說是老一輩的人物了。當我於民國十年在廣州看到他和吳稚暉先生的時候，他已經四十三歲了，而我還是一個正在讀高等師範學校一年級的學生呢！那時他已秘密組織中

共，和陳炯明有特別聯絡，被任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即「廣東省教育廳長。」吳稚暉來粵時住在教育廳內。我因邀請稚暉先生講注音字母，曾經到過教育廳多次，經過獨秀的辦公室，見他在裏面辦公，他個子高，寬額隆鼻，相貌頗為特別，我至今還彷彿留存一個印象。

除上述那些同時代的知名人物之外，還有汪精衛、章士釗、葉楚傖、趙聲及黃克強先生等，和獨秀都有認識，因為他一生的活動，奇奇怪怪，所接觸的方面很廣，認識的人也多了。他早年在上海時加入南社，曾與蘇曼殊（玄瑛）訂交，據柳葉疾，曼殊年譜稱：「一九〇五年曼殊至西湖，作畫寄陳仲甫；其畫跋云：『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按仲甫、仲子由己，都是陳獨秀的別號。粵語有云：「壞鬼書生多別字，」獨秀的別號甚多，從廣東人看來：當是「壞鬼書生」一流人也？又早在一九〇二，即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清廷正式宣告廢除科舉開辦學堂實行新學制的時候，獨秀與曼殊已在日本東京參加馮自由、蔣方震等所倡議組織的「青年會」，可知他和曼殊及蔣百里先生等早已熟識了。

書香之家秀才功名

陳獨秀出生於一個中等的家庭，（一說他父親曾經做過官，家中富有）祖和父都是秀才，也可說是書香之家。他的父親早死，幸賴他母親很仁慈賢慧，加以祖父的督教，以至於成人。那時候，在老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雖則已是百病叢生，頗受非議。但清政府一向恪守祖宗成法，不敢輕言廢棄這種使思想定於一尊

，近乎「愚民政策」而可以籠絡一般讀書人的考試制度。在光緒二十年甲午戰役以前，所謂書香之家的子弟，十載寒窗，埋頭伏案，每天照例的吟唔咕嗶，都以做八股文，作試帖詩和對聯為第一要務。獨秀當然也不例外。於是在很小的年齡，便被引上「子曰、詩云」裏面去討生活了。

這不消說，他當時所憧憬的是要得到科舉功名、作為出身的階梯，也可以揚名聲、榮宗族、誇耀於鄉里戚黨。因為從秀才爬到舉人、進士、翰林，學而優則仕，仍是當時讀書人所共同嚮往的響亮的頭銜和最光榮的出路呢。獨秀出生才幾個月，就沒有了父親。幸得祖父憐愛，親自教他讀四書、五經和左傳之類，每天早晨都要背誦好幾百字的經文。由於望孫成龍的心太切，當獨秀讀書不熟、背誦有錯漏時，即受祖父的打罵。但他賦性倔強，雖則挨打很痛，仍然賭氣忍受而不啼哭。這樣，更使得祖父動氣，越加使勁地打他。他的母親在旁看到這種情形，痛在心裏，時時勸他努力勤讀，以副祖父的厚望。獨秀聞言，乃深受感動。他曾在「實庵自傳」裏說：

「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着實有威權。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

他又在自傳裏指出慈母對他一生的影響。他說：「我性情暴躁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

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的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吧（？）

據說獨秀的母親很富於仁慈和同情心，時常將衣物送進當舖，得錢來濟人之急。又常對獨秀說：「不要看不起窮人，不許罵叫化子。」母親這些話對他日後做人做事，都發生了影響。例如他搞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或晚年所說的「無產階級民主」這些口號，似乎都和對窮人表同情，有相當關係。當獨秀九歲時，他祖父也死了。他於是進學塾讀書，但所從的老師，他都不滿意，尤其不願意學習那套考科舉最重要的八股文。到他十二歲的時候，才由他的大哥陳孟其教他讀昭明文選，一面溫習以前所讀的經書。直到他十七歲時（光緒廿二、一八九六年），在母親嚴加督責之下，才由他的大哥教他研讀袁枚諸家的駢文和制藝（即八股和試帖詩等），然後勉強去應考。結果爆出冷門，通過縣考和府考，高中了秀才第一名。做母親的看見兒子初露頭角嶄嶄的氣象，當然非常的高興。於是叫他準備參加第二年秋天在南京貢院舉行的「鄉試」考舉人。

揚棄科舉醉心新學

這時年方十八歲的陳獨秀，聽從慈母之命，於光緒廿三年丁酉中秋節前，（西元一八九六年九月）由安慶坐長江輪船趕到南京入闈應試，在貢院的號舍（俗稱「矮屋」）裏考了三場，住了九天，然後出場，聽候放榜。南京貢院，離秦淮河及煙花場所不遠，極便於舉子們的尋花取樂，

這也可說是南京貢院旁的一景。其實清代各省省會的貢院，規模大致都相彷彿。筆者在廣州所住的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即廣東貢院舊址，雖已經改建為學校，而舊日的建築物，如「明遠樓」、「至公堂」、「矮屋」等，猶有存者。有石碑刻乾隆御製詩云：

「終朝園隸院沉沉，景物當前總入吟。

才擬圭璋方特達，文歸雅正薄艱深。

禹門魚變辭凡水，喬木鶯遷返故林。

寄語至公堂裏客，莫教冰鑑負初心！

從這首詩意看來，可知專制帝王重視科舉之一斑。詩中的第一句說試場周圍，用荆棘圍着，門禁森嚴。第三四句言文章要歸於雅正。第五六句言考中了就可以發達，好像鯉魚跳過龍門一般，就不是舊日的池中物了。第七句「至公堂裏客」指那些典試委員。第八句說出「為國揀才，要公正無私」的意思。科舉考試的隆重舉行，於此可見，較今日考試院所舉行的高普考，似有過之無不及呢。

但科舉考試的形式和典禮，儘管隆重其事，而能否達成選拔真才和培養士氣及百年樹人的目的，則又未必如理想所期。而且剛剛相反，到了滿清末年，由於科舉八股積弊之深且大，已為有識者所共見共悉，從曾國藩、張之洞、嚴復，到黃遵憲、梁啟超等，都多少發表過廢除八股文，改良科舉或廢除科舉的意見。尤其是嚴復所作的「救亡決論」最為深刻中肯。他以為八股有三大害：第一、是錮智慧，即束縛思想於四書（學、庸、論、孟）五經（詩、書、易、禮、春秋）的

範圍，由秀才、舉人，而進士、翰林，自以為是通天地人的儒家，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平日高談什麼心、性、理、氣，明德新民、忠信廉恥，而實則無經世致用的才能。心中却虛驕自大，以為做秀才時既無不能做的題目，將來若做佐國的大臣，自然也沒有不能做的國家大事。俗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其實都是謬妄糊塗，不切實用。第二、是壞心術，試場的積弊，由來已久，有所謂「通關節」、「代考」、「請槍手」、「聯號」、「換卷子」各種毛病，防不勝防。尤其是有錢有勢之家，財可通神，加以這時照相術尚未發明，頂替代考，較為容易。又即使考試不作弊，而文章制藝，多屬於揣摩風氣，剽說雷同的陳腔爛調，無補益於國計民生。第三、是滋游手，這就是說以八股文取士，使讀書人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其幸而考中舉人、進士、翰林，固然可得晉身的階梯。如果僅得一名秀才，甚至連考多次，一名秀才也得不到的「童生」，「十年隍下無人問」，讀書不成，功名不就，又沒有正當職業，以維生活，結果是變成高等游民，也可說八股之害，是製造許多「游手」好閒的人。廣東話說的「讀書不成三大害，衙門、風水及行醫！」（即跑衙門當訟棍、看風水或自命為「儒醫」）也就是嚴復所謂的「滋游手」了（參看嚴著：救亡決論）

科舉的弊端很多，決不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所能通通知曉。可是當陳獨秀在貢院矮屋之下困住了幾天，看到考生（按：他們都是秀才）們種種怪現象，就不免感慨萬端。他本來是看不起八

股時文的人，於是聯想到國家一切古老制度遺傳下來的許多毛病和個人的前途，都非改弦更張不可。誠如他的自傳所說：

「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我此次鄉試，本來很勉強；不料其結果却對於我意外的有益。」

強剪官辮震驚東瀛

鄉試落第後，獨秀乃前往浙江杭州，入「求是書院」求學。三年後即戊戌維新及政變後一年，柏文蔚等組設「安徽公學」及「徽州公學」，研求較為實用的學問；並借用維新派巨子汪夢周所設立的「科學圖書社」作為會議的機關。獨秀曾寄住汪夢周處，在書社樓上編輯「安徽白話報」，開始做宣傳革命的工作。那時他只有二十一歲。

由於「安徽白話報」有排滿及批評時政的文字，被迫停刊。獨秀乃於庚子年（西元一九〇〇）東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兩年後的冬季，加入馮自由等所組織的「青年會」，這個會的旨趣，明白揭出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所謂破壞，即革命必先破壞而後建設的意思。近代中國革命組織由「國父領導，導源於一八九五年開始的「興中會」，而成功於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同盟會」，這是大家所周知的

事實。而在一八九五——一九〇五這十年間，上海和日本東京等處成立的革命團體或救國團體頗多，獨秀所參加的「青年會」亦其中之一。

獨秀在東京，曾和革命志士數人串演一幕趣劇。當時湖北留學生監督姚昱，愛管閒事，常常干涉留學生的行動，於是學生們開會，秘密決議對姚昱施以報復。有一天竟然乘其不備，由張繼抱住姚昱的腰部，鄒容捧着姚昱的頭，而由陳獨秀拿剪刀硬把姚昱的「豬尾巴」（即由頸後下垂的髮辮）剪去。他們這種敏捷的強迫剪辮子的動作，對於姚昱個人算是一種懲戒，而對滿洲人入關後強迫漢人留辮子，「留髮不留頭」的野蠻手段，也是一種報仇反抗的表示。姚昱被剪掉辮子以後，即刻向日方警察機關交涉，並由駐日公使館提請日本政府驅逐張繼、鄒容、陳獨秀三人出境，由公使館遣送回國。這是同盟會成立前三年中國留日學界所發生的震撼人心的大事件。這件事的影響，有助於同盟會的產生，和國內革命運動的進展。

和鄒容、章炳麟之間

鄒容是四川巴縣人，一個早期的熱血青年革命鬥士，他底民族意識非常的堅強，曾著「革命軍」一書，章太炎（名炳麟）替他作了一篇序言，愛國人士爭先閱讀。此書雖遭清廷禁售，但暗中仍銷售很多。

這本書歷數滿人入主中國二百餘年的罪惡，很能刺激起我漢人同仇敵愾的心情。這次他因「割辮子」事件，由東京回到上海，暫住蔡元培等所

發起組織的愛國學社內，又為「蘇報」撰寫排滿的文章，大觸清廷之忌。上海租界當局接納滿清政府兩江總督的要求，於是封閉蘇報館，將鄒容和章太炎等拘捕入獄，鄒被判監禁兩年，章則坐監三年，這是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閏五月（陽曆七月七日）的事。太炎在獄中有贈鄒容詩云：

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州。（按「瀛州」是指日本）

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餼。（「除辮」指上述姚昱事）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愁。

臨命須揜手，乾坤只兩頭！（按此兩句指他們的兩顆頭顱，如被砍掉時，當攜手同死！）

這首詩表示有必死的決心，以為乾坤雖大，只有這兩顆頭顱，可稱英雄。所以作者說：「英雄入獄，天地悲愁！」意氣非常豪壯。（只稍嫌誇大了一點）。但到後來不久，鄒容竟病死獄中，太炎則於三年期滿時出獄，東渡日本，兩年後主持民報筆政。

陳獨秀回國後，即返回他的故鄉安慶，於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約集本省志士開演講會於藏書樓。他在演說中指出：國事緊急，外患尤為迫切，瓜分之形式已成，非提倡軍人精神，不能救國。他於是提議組織「愛國會」發行「愛國新報」並擬聯絡上海的「愛國學社」及東南各省志士，成立「國民同盟會」使東南各省地區，成為獨立自主的局面，不受異族的欺凌云。這時獨

秀正是一個大有為的青年，虛歲只有二十五歲，意氣之盛，堪與章太炎、鄒容等比擬。

是年七月，鄒容等入獄，八月獨秀和張繼、連橫（雅堂，筆名慕秦），章士釗等在上海創刊「國民日報」繼承那被封閉的「蘇報」精神，言論十分激烈。但這個報紙發行不到三月，即被查封。該報未停刊前，其中「文苑」一欄，有署名「由己」的舊體詩，即陳獨秀本人所作，有「哭汪希顏」兩首，茲錄如下：

其一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
而今世界需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其二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
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這晚詩中的汪希顏，是陳獨秀的同志好友。至於「聯邦新制度」可能和獨秀日後所主張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的聯省制有關的，其實這只是一種空想而已。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春天，蔡元培等在上海創辦「警鐘日報」正是獨秀在安慶家中生病休養的時候，但他時常寫些詩在這個報上發表。到了這一年的秋天，他就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用白話文寫稿，作革命宣傳，這時他已開始提倡白話文，比較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和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共同提倡「文學改良」或「文學革命」運動，大約早了十三年。

行蹤不明附驥革命

三年後，（西元一九〇七）獨秀在浙江陸軍小學擔任國文教習，曾作了號召革命的幾篇檄文，由隊官中的對他表同情者，拿出去張貼，以供大眾閱讀。他這一驚人的舉動，當然不為滿清政府派駐杭州的官吏所容許，同時亦引起社會上的許多議論，其結果是獨秀被迫離開杭州，以後就行踪不明。即從光緒戊申年（西元一九〇八）至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辛亥，這四年之間，陳獨秀究竟在做什麼，我們缺乏可靠的參考的資料。有人說他到東北，護送他大哥的骸骨歸鄉里，有人說他到了法國，也有人說他曾經參加柏文蔚將軍的戎幕。這幾說是否與事實相符，尙待查證。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各省都先後響應。柏文蔚繼陳其美在上海宣佈獨立之後，帶兵參預了光復南京之役，旋就任北伐聯軍總司令，民國元年五月，任安徽都督，委任陳獨秀為祕書長，兩月後調他為教育司司長。（當時的教育司，後改稱教育廳，這時獨秀只有三十四歲。可說是壯年得志。）直至民國二年八月，國民黨討袁之役，「二次革命」失敗，柏文蔚出走，陳獨秀逃至蕪湖，被當地駐軍逮捕，即將執行槍斃，幸得朋友們極力營救，才獲得釋放。他於是急走上海，乘船到日本東京。次年參加「歐事研究會」並協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民國三年為陰曆甲寅年，該誌恰於是年出刊故名「甲寅」）。四年夏天，自日本回上海，於九月十五日，創刊「青年雜誌」出刊了一年之後，改名為「新青年」至民國十三年停刊，共出了九卷，（每卷十二期）

。除主編新青年外，有一個時期，獨秀還兼主「中華新報」筆政。民國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的中華新報，刊出獨秀的一篇專論，標題為：「政局之根本解決」作者自出心裁，主張實行南北分治的制度，即以長江為天然界線，北洋系治理北方，國民黨則統治南方，另由南北兩政府之中，選擇其一，為大總統所駐地，對外代表國家。這種不倫不類的想法，當時並沒有什麼人贊同，其後獨秀本人亦自覺其觀察的淺薄，主張的魯莽，故未將這篇文章收入「獨秀文存」裏面。

大家知道：五四運動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如今快要屆滿六十週年了。第二部分，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包括白話文運動在內）這後一個運動，沒有明確的起訖時間，大概可以說從民國五、六年至民國十三年止，大約延長了七、八年之久。到民國十五年北伐，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十七年統一全國以後：一方面是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取代了五四的全盤西化（或儘量西化）論，另一方面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逐漸擴張其俄化的勢力，許多左傾的青壯年人，大都崇拜蘇聯，以俄化替代西化。另有一批比較少數的人，傾向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則希望以溫和的社會主義依合法的程序，逐漸取代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後者亦即五四時代所揭櫫的「德謨克拉西」先生）。

新青年雜誌兩階段

陳獨秀一生的成名，幾乎全得力於「新青年

雜誌」特別是民六至民九這四年間出版的「新青年」，在這個時期，陳獨秀和胡適，成爲青年們心目中的兩尊偶像，特別是正在唸大學的知識青年。筆者本人就是民九開始入學的大學青年，我還記得那時的同學們爭先恐後閱讀「新青年」的情形。以介紹新思潮而論，民九以前的「新青年」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其次是北大出版的「新潮」，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和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等）真是名符其實的青年們最歡迎的自己的刊物。民九以前陳獨秀的思想還沒有轉變，他的文章很慍懣，熱辣的帶有濃厚的火藥氣味，攻舊禮教，倡新人生觀，合於年輕人的口味。因此他的名譽，正如日中天。這時期的「新青年」真是一枝「獨秀」，風行全國，可以說是自有報章雜誌以來影響青年思想最大的定期刊物。那時上海商務印書館所發行的幾種刊物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等，歷史雖比較久，銷行量也還不錯，但都不能和「新青年」相比。民九以前「新青年」的成功，真是空前的。但從民九年起，陳獨秀的政治思想轉變了——由民主主義轉變爲共產主義或馬列主義，「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專號」對蘇聯極力捧場；由民主陣營，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這個轉變的確太大了，太突然了，也太偏激了。於是絕大多數的讀者，都厭倦了「新青年」，看輕了要赤化青年思想的左傾作者。尤其是我們這批傾向民主自由崇拜杜威、羅素，敬仰胡適，而又厭聞國父孫先生批評馬克思主義不合國情的青年人，更是討厭言論轉變以後的「新青年」。從這時候起

，它的銷路，也一落千丈（至少在廣州方面如此）。而陳獨秀的聲譽，也從此走了下坡。儘管他在中共中央，登上「總書記」的寶座。其從國民黨於十三年改組，容許共產黨分子以個人資格加入，陳獨秀又當選爲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一脚搭兩船，地位已是够高的了。加以一九二二年，他代表中共出席莫斯科第三國際會議，使其聲望更隆，幾乎有「中國列寧」的徽號。他又於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在武漢和汪精衛聯名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排斥定都南京正在反共清黨的國民政府，要求 蔣公下野，氣絀咄咄逼人。這個時候的陳獨秀，似乎是志得意滿，不可一世。他和一向反覆善變的汪精衛，合唱雙簧，以爲「天下英雄，只有使君與操而已」！孰知好景不常，不過四個月左右的時間，中共在武昌舉行緊急會議（時在同年的八月七日，故又稱「八七會議」）決定改組他們的中央委員會，以瞿秋白爲總書記，推倒陳獨秀自民十組黨以來的領袖地位。認爲他過去的領導，完全錯誤，這是中共組黨後第一次大分裂。而獨秀則反唇相譏，認爲是第三國際領導錯誤。其後，中共的六大會，又對他加以譴責，最後，並開除他的黨籍，同時被開除的，有彭述之、高語罕、李季等，於是獨秀在中共裏面的名位，就好像從顛峯狀態滾落到平地上面。這是共產黨鬥爭自己「同志」慣用的手法，原無足怪。何況是第三國際授意的，中共的中委們，誰也不能反對。不過獨秀驟然從辛苦得來的寶座上摔下來，面子上當然很難堪。瞿秋白以後輩的資格，對獨秀也有一點友誼，頗覺難

爲情。但有些極端厭惡獨秀的，稱他爲「陳毒獸」因爲他發起搞共產黨貽禍中國，好像洪水猛獸一般。在這次受了打擊以後，他只好潛回上海，藏身於洋人庇護下的租界中，直至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被捕之日，他都沒有離開上海。

但是，陳獨秀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和英雄主義者，他既然扶搖直上，一度雄飛之後，再也不敢伏。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年將老而仍不服老，不願作「元老派」，而仍想保持他青年時代的作風。繼承「新青年」「嚮導」之後，出版了「火花」和「校內生活」等刊物，但影響並不大。

與俄共托派的關係

以列寧爲首的蘇俄共產黨，原是俄國社會黨中最急進的一派，稱爲「布爾塞維克」，（又稱「聯共布黨」Bolshevik，比較溫和的一派，則爲「孟雪維克」。）托洛斯基在布黨中的地位，是僅次於列寧的第二號大頭目。但自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史他林當權，於是鬥垮了托洛斯基，並列寧死，史他林驅逐出境。他在流亡生活中，建立了一九二八年將他驅逐出境。他在流亡生活中，建立了反史他林的共產主義國際組織，稱爲「布爾塞維克左派反對派」有人稱它爲「第四國際」藉以表示它和史他林控制下總部設於莫斯科的第三國際有所區別。最後一九四〇年他本人被史他林派刺客在國外暗殺掉，所謂「托派」也就此完蛋了。

中共是馬、恩、列、史的徒子徒孫，特別是在史他林手上壯大起來的。因此，它的「幹部派」是絕對聽命於莫斯科的。（他們歌頌史他林爲

「天上的太陽」什麼的，自有他們「感恩圖報」的理由（陳獨秀既然被擁史的幹部派開除，而又不甘寂寞，自然要尋求和史他林死對頭的托洛斯基派（簡稱「托派」）的支持。恰巧在一九二九年，留俄中山大學一批托派學生，於是年九月，回國秘密活動，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舉行所謂左派反對派（其後又名取消派）的第一次大會，陳獨秀即與之取得聯繫。那時因為中俄中東鐵路問題，史他林曾於一九二九年八月，派大軍侵略我東北、而中共中央，竟高呼「擁護蘇聯」的口號，以捧「史他林爺爺」。陳獨秀和新返國的托派共產分子，則公開表示反對這種出賣祖國的口號。從這件事看來，陳獨秀倒還有一點國家民族的意識，比李立三、毛澤東他們似乎略勝一籌。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月十五日，陳獨秀彭述之等在上海被捕，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托派）的領導工作，改由劉仁靜負責。但其形勢，則每況愈下，托洛斯基死後，（一九四〇，八月二十，被刺）中國的托派也就消聲匿跡了。

被捕獲赦及身後事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陳獨秀與彭述之均被判十三年有期徒刑。陳在獄中研究中國古代語文，撰有「實庵字說」一篇，在東方雜誌發表。

二十六年七月，抗日戰事發生，政府宣佈大赦，陳獨秀獲釋放出獄，共計坐牢四年餘，這時他已五十九歲了。出獄後初住南京，後遷居武昌、長沙、重慶，最後隨其母親和他的繼室潘氏定居於四川江津。先租東門城內的「郭家公館」；

旋移居大西門外「延陵別墅」；再後三遷到城外二十里的鶴山坪「楊凡山莊」。在四川這幾年，他的生活相當安定，思想上亦大澈大悟，至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才因病在江津逝世，享年六十四歲，可稱為「下壽」，旋安葬於江律大西門外鄧氏康莊。戰時交通不便，消息阻滯，三十一年暑假，我在粵北韶關，至三十二年春我到重慶服務，才聽聞獨秀逝世的消息，為之黯然而已。最近聽說：他的墳墓已被中共毀掉，這消息如果屬實，更證明共匪的毫無人性和人性了！

陳獨秀的第一個太太，姓高氏，（二十二年病死）生子三人，長子延年，次子名松年，老三名喬年。他為這三個兒子命名，都取「延年益壽」之義。事實上却因叫兩個兒子搞「共產革命」而送掉性命。老大延年，和老三喬年，都是留法勤工儉學生，其後轉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然後回國為中共工作。延年於民國十四年領導廣東共黨活動，被稱為「具有特殊組織才能的人物，準備做「廣東王」的。十六年夏天，他兼任中共長江局書記，企圖挽回「清黨」後共黨的頹勢，旋於同一年的六月底，因另一個共匪分子自首而被捕正法。其弟喬年，亦有幹才，而陰險狠，實勝於獨秀。十六年八七會議後，獨秀雖被罷黜，喬年則受任為中共中央委兼組織部長，在上海活動，極力發展工人運動的工作，於十七年一月被捕。老二松年則已早死。獨秀元配高氏實因他搞共產而分居，真是因他一念之差，而家散人亡了。這也可說是由於邪惡思想所造成的一個家庭的小悲劇吧！而最大的悲劇，則是近三十年，

中國大陸人民所受的災禍，陳獨秀乃是一個始作俑者。（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思想歷程三個階段

幸而陳獨秀晚年，能自悔悟，覺已往之迷惑，知今是而昨非，也算是在思想上一個善於轉變的覺悟者。雖則有人認為這個轉變，是大錯既經鑄成，禍國殃民，滔天大罪，悔之已晚。但我總覺得與人為善，不究既往，是我國傳統文化儒家的恕道精神，他既然脫離共黨，不是敵人，便是朋友了。政府已寬赦他過去的罪行，我們又何必悻悻然鎔錘計較，多費筆墨，歷數他自己業經承認的思想錯誤，這如何能說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呢？

陳獨秀的思路歷程，簡單說來，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 第一、是五四時代提倡「新文化運動」階段；
 - 第二、是迷信共產主義階段；
 - 第三、是最後覺悟階段。
- 第一階段，主要是以民國四年至民國八年的新青年雜誌為代表，這時期獨秀的思想言論，偏重在抨擊傳統文化，介紹新潮派思想，提倡「民主」、「科學」，和新生人觀，主張文學革命，很受青年學生的歡迎，也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從而奠定他和胡適在思想史和國語文運動上的地位。但有些言論，不免流於偏激：諸如「選舉妖孽」、「桐城謬種」、「喫人的禮教」等口號。又以為孔子之道絕對不合於現代生活，必須將「孔

丘這塊招牌」取下來，和吳虞一般的大聲疾呼打倒「孔家店」。這些話雖則勉強可以自圓其說，但總是太過火一點了。

雖曰覺悟仍未透澈

第二階段，從民國九年，他誤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以為可以行之於中國。其實他對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都瞭解得非常之少，以致盲目的接受宣傳，受第三國際的欺騙和利用而不自知其錯誤。他曾經發表文章，介紹馬克思「唯物史觀」、「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勞工專政」（按即「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這些不合科學的一元論和獨斷論，自十九世紀末年以來，早已被歐美學者駁倒了，自 國父於民國十三年講演民生主義以後，中國知識分子更多認識馬克思的謬誤。而陳獨秀、李大釗等，仍以之為惟一的真理，這完全是誤信或盲從，不值識者一笑的。陳獨秀領導中共不及毛澤東後來的「成功」，因為陳畢竟是書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毛却是一個「梟雄」，能以統戰手段和「槍桿子出政權」，一輩子拼命蠻幹到底。

第三階段，從抗戰開始到他臨終前大約五年的時間，他的思想轉變，回復到自由、民主。但中共的「新華日報」則以惡毒口吻，罵他為「托派漢奸」。這時期他所發表的言論，由他的朋友，於民國三十七年（即是他死後六年），編輯成書，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他曾鄭重聲明：他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深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他認為

蘇聯的領袖們自列寧以下「都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的真實價值」，而只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作為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他林統治的蘇聯。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還是學習蘇俄的。從這些話看來，可知陳獨秀已放棄了階級鬥爭和由無產階級獨裁的所謂「新民主」理論，而傾向於西歐、北美的議會的民主政治，幾乎完全回復到五四時代「德謨克拉西」的主張了。由放棄共產黨專政到民選議會的民主政治，這不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嗎？胡適之在為獨秀這本小冊子所作的序言中說：「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這的確是知言。但我總認為獨秀的「最後見解」，只是談言微中，而美

中不足，覺悟並不澈底。因為今天西方的議會政治、主權完全在民，不論是有產者或無產者不分階級同樣有「神聖的一票」，無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了。資產階級民主這個名詞，原是共產黨漫罵西方民主政治的詛咒語，一種不合事實的惡意宣傳。陳獨秀在「深思熟慮」之後，已知道「無產階級民主」是個空洞的抽象名詞，却不知「資產階級民主」，乃是共產黨的惡意宣傳，用來故意低估西方民主政治的價值的，那真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然而「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放寬尺度來衡量，中國古書上這幾句箴言，仍勉強可用在評論「陳獨秀最後對民主政治的見解」上面。

中外文庫
之三十二

華美心聲

傅岩教授著
定價台幣伍拾元

「華美心聲」一書，係立法委員、名教授傅岩女士精心傑作，她成功的、深入的研究了中美兩國的社會形態，家庭生活，青年問題及兒童保健等諸項目，作精闢獨到的評論，適合各階層人士研讀，要目有雪泥鴻爪晚晴天、美國政治社會鱗爪、美國社會與青年、美國式的婚嫁、美國人的家庭生活、美國兒童的教養、美國家庭的觀察、幫助女子成婚、沒有婦女立足之地嗎？談婦女運動、中國婦女政策與兒童保育、中國婦女總動員、中國婦女對反攻工作之準備、婦女的新生活與新道德、婦女人格訓練的重要、如何使兒童精神健康、兒童青春期中所生問題之處理、兒童呼聲——女性天然優於男性、如何防止肥胖等佳作，篇篇精采。吳延環、賴景瑚序。定價台幣50元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誌雜誌。